

泰國政變的背景與評價

羅石圃

泰國總理他儂于本年十一月十七日宣佈：解散國會及內閣，停止實施憲法，由軍警組成執行委員會接管政府，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實施戒嚴。這究竟是為了應付共匪混入聯合國後對泰國所造成的危機，乃不得不擺脫國會政客們的阻撓？還是為了內部權力的爭奪？對今後泰國以及整個東南亞局勢的影響如何？這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 歷次政變與反共的關係

西方國家，認為民主政治是抵制共黨叛亂的武器，但在赤浪橫流的東南亞作為中流砥柱的泰國，則是靠歷次政變以粉碎共黨的赤化陰謀。除一九三二年的政變，是將君主專政改變為立憲政體而外；像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政變，表面上雖為鑾披汶向乃比里奪得政權，實際上亦即避免了共產國際指使乃比里使泰國變色。他如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政變，解散了被共黨份子滲透的國會，使內閣權力增強；一九五八年政變，推翻了明結自由陣營、暗通共匪的鑾披汶政府，由陸軍成立革命委員會接管政權，實行堅定的反共政策，這才奠定了十餘年來泰國安定繁榮的根基。（註一）

由于泰國自第一次革命——一九三二年推翻君主專制政體以來，即由兩大勢力支配全國政治：一為鑾披汶所代表的陸軍；一為乃比里（Nai Pridi Panomyong）所領導的黨人。這位出身巴黎大學的法學博士，于學成歸國後，先後出任朱拉隆功大學教授及法政大學校長，並組成「人民行動黨」而自任黨魁。當憲政後的首次大選，該黨所得的選票最多，本應由他組閣，但以當時保守勢力強大，以致他自動退入幕後，交由鑾披汶所領導以陸軍為基礎的「國民黨」主政，他則出任財政部長；加重商業納稅，規定限制華僑經營的業務，藉以籠絡泰國農民，挑撥泰華民族關係，便是他出主財政時的傑作。可見乃比里在泰國潛勢力的深厚及左傾作風的一般。（註二）

由于他所主張的「土地國有」政策，被國人揭穿其共黨面目，遂不得不逃亡國外。但至日本軍閥積極南侵時，他又在共產國際實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下，得以重回泰國再與鑾披汶合作，扮演親日與抗日的不同角色。鑾披汶以內閣總理身份迎接日軍和平登陸，乃比里以攝政地位組織「自由泰」政府，實行地下抗日，暗中與盟軍取聯。至日軍投降，鑾披汶以戰犯入獄，他則以勝利者的身份接管政府，使泰國免于列入戰敗國而無須付出賠償。惟以當時的八世王洞悉他負有共產國際赤化泰國的任務，準備將王位昇予其弟即現任的九世王，俾其本人得以在野之身組黨與乃比里從事競選，因而有一九四六年六月八世王在宮中被刺身死的血案發生。（註三）

全國軍民一致悲痛八世王遇害，且認為乃比里出此毒手而甘冒大不韙的目標，乃在執行共產國際的赤化陰謀，所以激起了陸軍與警察的忿慨，遂不再擁出鑾披汶而將乃比里政府推翻，使這位犯有弑君罪的赤色政客再度逃亡，進入中國大陸接受養。共匪不僅為他設有「泰國愛國陣線」傀儡組織，且在華南設有「泰國革命之聲」廣播電台，日夜以泰語攻擊曼谷政府，至一九六九年一月，北平且公然宣佈泰共已編組成「泰國人民解放軍」（註四）。可見乃比里及其泰共組織早已公然成為共匪侵泰的工具，照理，泰國上下應該對他一致唾棄。誰知去年共匪將他移居巴黎，泰國國會議員——包括執政黨議員在內，竟有不少人主張將他迎接回國，昇予對北平談判的特使任務（註五），以致反共陣營自亂陣腳，使洞悉奸情的軍警領袖早已為此憂心忡忡，此次政變，即為了制止乃比里潛伏勢力的蠢動。

二 兩面外交思想造成赤化危機

泰國是虔誠信仰佛教而酷愛和平的國家，有三百多年沒有發生過大規模流血戰爭。一般泰人多迷信富貴是前生修來，對大官富商的享受並不嫉恨，所以共黨難以挑撥起貧苦人民的階級怨仇，流血漂鹵的戰爭，自然更不易擴大。但也正由于酷愛和平與樂天安命的觀念，遂形成了泰國士大夫的國防思想不重兵力而重外交。他們認為泰國位居東南亞要衝，為強權必爭之地，祇有以強權制強權，在無須從事兵爭的情況下得到安定為上策，如不幸而成為戰場，縱使得勝，亦必陷國家于難以恢復元氣的境地。

當西方勢力東來，東南亞各國都已成為列強殖民地的時代，泰國始終得以保持獨立，便是得力于以英、法互相牽掣的靈活外交，這是泰國知識份子所樂道的。至二次大戰期間，由地上親日而換來日軍和平登陸，免受戰爭的浩劫；再由于戰後地下抗日的「自由泰」政府出現，又得以免除戰敗國的懲罰，更使泰國士大夫相信國防不在強大的兵力而在靈活外交。所以當中國大陸淪陷，共匪積極向東南亞進侵時，泰國政壇上從內閣到國會，無不是瀰漫着兩面外交的氣氛，祇有陸軍和警察，體認到共匪正在利用乃比里對泰國進行兩面外交的陰謀——企圖不戰而使泰國變色。

一九五一年泰國海軍政變，雖經陸軍警察聯合將政變救平，但當時的國務院長鑾披汶遭受劫持而不知下落，不料三天後，他竟得以安然返回曼谷。據當時曼谷方面推測，認為此次政變的目標，祇是共匪利用泰國海軍將鑾披汶劫赴某一基地與乃比里會談，其要求無非是彼此再扮演一次兩面外交的不同角色：一方面在曼谷主持地上反共政府，但須在民主自由旗幟掩護下，儘可能容許泰共活動；另一方面在匪區設立地下政府，與共匪建立親暱關係，一旦緬、寮、越、柬變色，即由乃比里率地下親共政府接管政權。所以雙方獲致協議後，亦即各回原地。證之以鑾披汶返回曼谷後，迅即釋放被捕的共黨份子，開放言論，讓左傾者肆行無忌，顯示此種推測並非臆斷（註六）。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作為鑾披汶政府核心組織的軍警政團，恍于國會左翼政客在鑾氏縱容下的猖狂無忌，遂不得不再發動政變解散國會，將兩院制的國會改為一院制，由官派與民選議員各佔一半，且下令除擁護政府的「聯

合黨」而外，不許再組其他黨派。至一九五二年，又由國會通過「防共條例」——即一般所稱的「反共法案」，並根據此項法案，對共黨份子及其同路人大事搜捕，這才使共黨的顛覆活動暫告平息。不料一九五五年開放政黨活動，至第二年舉行普選重組國會後，共黨活動更藉政黨與國會而益形猖獗，乃比里且公然派遣其妻與子回到曼谷展開活動。因而促成了一九五八年的陸軍政變，肅清共黨勢力，斷絕與大陸一切往來。（註七）

三 新國防思想產生富強果實

溯自我大陸淪陷以來，共匪在南進計劃中，幾乎是以泰國為第一目標，這從它在大陸成立的各國共黨傀儡政權以「自由泰」最早即可概見。一般人祇知泰國有三百萬華僑，是北平視為赤化泰國的重要力量，殊不知泰國的泰人和苗、傣、保黑各族，都是滇邊各少數民族的分支，其往來遷徙，一向無分畛域。由此種人文及地理密切關係，即可見共匪伸展其勢力于泰國乃輕而易舉。（註八）

更重要的，為泰國的傳統國防思想——不重兵力而重外交，所以北平認定祇須煽動政黨及國會迫使政府與它建交——無論是地上建交或地下勾搭，都可使政權變色，因而特別注重統戰。這從二十多年以來，泰國每次開放政黨活動及恢復國會，便迅即形成紅流泛濫的情勢即可概見。一九五八年成立的陸軍政府，其最大的貢獻，在于根本改變了泰國的傳統國防思想，揚棄了兩面外交。軍政府一面整軍經武，聯合盟邦，阻敵人于國境以外，一面致力于經濟建設，配合軍警剿共，俾求安內于建設繁榮。

在鑾披汶執政時代，雖標榜反共與親西方外交，但在國防上並不從事積極建設，如當時美國表示願意援助其擴建北部重鎮的清來機場，泰方並未接受，對華府援助其擴充國防兵力的建議，亦僅接受其增加警力的援助部份。所以一般人均認為當時的泰國國防，是消極的撤退——當鄰邦不守時，即由親共的政府出現而與敵人合作，避免國土遭到戰禍。所以共匪對泰國所着重的是心戰和統戰，形成了一九五八年陸軍政變前夕的危機，使國會和內閣都在看着受共匪蒙養的乃比里指揮棒行事。

陸軍政府成立後，在斷絕與大陸一切包括商業的往來同時，毫無保留地

接受美國的軍經援助，一面擴充國防兵力，興修由柯叻直達寮國邊境的戰略公路以及北部第一線各省的軍用機場；一面開始經濟社會建設，更進一步將國土供作美軍接越基地，並出兵為遭受共軍侵略的鄰邦協防。這是從根本上改變了泰國的傳統國防思想——揚棄以兩面外交代替國防的觀念，為避免使本土成為戰場而遭受戰禍，儘量阻敵人的侵略于國境以外。（註九）

在軍政府執政的十年期間，證明根據此項新的國防思想所訂定的建設計劃，對泰國的安定繁榮，確有極大的貢獻。從經社建設方面看：其第一期從一九六一年開始，至一九六六年完成，已使國民收入每年每人一千九百十九銖零九士丁，增加到二千四百四十一銖，增加的幅度在四分之一以上（註十）。再從交通建設看：公路建設，是將繁榮帶到鄉村的首要措施，截至一九六八年止，其全國國家公路為一二、〇〇〇公里，府屬及縣鄉公路為四、〇〇〇公里，較經社建設實施前，已增建延長了四、〇〇〇公里（註十一）。尤其是這些公路，大都是以溝通邊境共黨盤據地區的交通為主，所以對繁榮與安定具有雙重意義。

他如曼谷、南邦、彭世洛、清邁、清來等處機場的擴建，與雷達站及全天候設備的增加，東北部烏汶、烏隆、洛昆拍儂、柯叻等地機場，均已擴建為可供噴射機起落，以及東北線、西北線、南線、北線每日定期班機的飛行，使曼谷至全國各地空中交通四通八達（註十二）。至于桃梭邑由美軍興建的海空聯合基地，其機場可供B五二轟炸機起落，碼頭裝卸設備，都是使用機械操作。在戰時可供軍用，平時對外貿易運輸，可以發揮極大功用，這無論是站在阻敵于國境外或遠程經建計劃的立場，都不能不說是極大貢獻。

四 開放民主後遭受共匪統戰

在兵力方面，泰國接越的黑豹師既擁有全部的美式新裝備，且由越南戰場獲得了對共軍作戰的經驗；出可以協防鄰邦，退可以保衛國土。加上入寮的二十五營泰籍傭傭兵，接受了反游擊戰的高度訓練與擁有特種裝備，更是貫徹了阻敵于國境外的思想，可謂助鄰邦即所以保衛國境。（註十三）

如何使開放民主後仍能保持此項積極的國防思想？這是陸軍政府經過十

年修訂新憲法的主要目標。雖然新憲法規定國會分為上下兩院，上議員由泰皇委任，名額佔下議員總數四分之一，一切法案，均須由兩院議員聯席會議通過。內閣既並非由國會多數黨產生，乃由皇上委任（註十四），執政黨祇須在大選中贏得下院四分之一以上的議席，即可得到國會的多數票。而在一九六九年二月的大選中，以軍政府幹部為基礎所組成的「泰聯黨」，已贏得了下院二百九十九席中的一百一十一席，連同委任的上議員，執政黨可謂擁有國會的絕大多數議席（註十五）。

行憲後的新內閣既由他儂蟬聯總理，除少數年老多病的閣員不得不退休而外，其餘都是前軍政府的原班人馬。照理說，新政府的一切大政，均可以在原有的基礎上順利前進，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回顧新政府在成立兩年零九個月以來，幾乎無日不在遭遇到內外的挑戰——明槍暗箭，幾乎使領導核心的他儂與巴博之間形成分離。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國際情勢所促成，但主要的，還是由於共匪利用乃比里對泰國所施行的統戰，頓使兩面外交的思想復活，政府所遭到來自國會與執政黨的壓力與日俱增（註十六）。

泰國的政黨雖經一九五八年陸軍政府成立後下令全部解散，到一九六八年準備大選再度開放時，時間雖經過十年，但再出組黨的，仍是先前的人馬。由于這批人在其故鄉都擁有選民的基礎，他們也都當選重入國會。執政的「泰聯黨」，如從黨魁與中央領導陣容看，盡是軍政府的領導人；但其當選進入國會的，又絕大多數是當年變披汶領導的「自由黨」人。因為在軍政府時代，他儂為了未來開放民主時的組黨準備，早就分別指定巴博與其胞弟沙牙對黨人予以聯繫，所以當「泰聯黨」組成之日，他們都全部加入該黨（註十七）。

一九六九年舉行大選之日，正值美國宣佈停止轟北越謀求和談結束越戰的時期，英倫亦于此時決定放棄遠東防務，以致攻擊政府的親美外交政策，成為反對黨競選的宣傳主題。至國會組成，新內閣成立，雖然反對黨在國會無勢力迫使政府改變外交政策，但執政黨內則瀰漫着改採兩面外交的暗潮。尤其是去年春間，共匪將受它象養二十年的乃比里移居巴黎後，更使國會的政客們認為正是北平敞開了與泰國進行地下外交的後門。先有一位執政黨的議員在國會公然向他儂建議迎接乃比里回國，委以與共匪談判專使的任務，雖經他儂斷然拒絕，但接着又有執政黨議員十人聯名，再提出同樣的建議（註十

八)。

由他僂派遺泰銀總裁乃潘過赴巴黎，警告乃比里切勿採取製造泰國內部分裂的行動(註十九)，即顯示他遷居巴黎後所帶給曼谷政府的困擾。執政黨的左傾議員由于親匪外交的主張遭到他僂的閉門羹以後，迅即在國會再與風作浪，先由執政黨議員六十人聯名，要求修改憲法中「議員不得兼任閣員」的條文；接着又醞釀彈劾財長乃森博士，經長乃汶差，建長乃樸博士等五名閣員，一時風雨滿樓，以致曼谷郵報披露此項消息時，其標題為執政黨議員企圖「造反」。身為執政黨兼內閣總理的他僂幾經週折始平服了黨內的風浪，但接着而來的「加稅法案」，幾乎在國會觸礁。

政府爲了應付國內外共黨的壓力逐年加重，不得不加強國防措施，其所需增列的國防經費，祇有計劃從增加入口貨稅率中開闢財源。誰知國會中對加稅法案的反對聲浪，執政黨議員較在野黨尤高，且有卅六位執政黨議員，公開發表反對意見——聲明寧願辭職，也不會投下贊成加稅法案的票。雖投票的當天，曼谷形成了軍警戒森嚴的緊急狀態，謠傳此項法案如被否決，即將導致軍警再度政變而解散國會，始以一票的多數得以過關。但接着在選舉預算特審委員時，又有執政黨議員陣前倒戈，使當選的反對黨議員得佔多數。上年度的預算分配案得以完成立法手續，乃由政府應允了對投贊成票的，即撥付一百萬銖作爲其從事地方建設的經費。本年的執政黨議員支持費，又提高到了每人十萬美元的要求，以致他僂幾度表示要退出政壇。(註廿)

五 共匪的統戰目標

自國會重開以來，修改憲法的風波一直在不斷掀起。反對黨所要求修改的，是變更官派與民選議員的比例，將內閣閣員由皇上委任的條文修改爲由多數黨組閣；執政黨議員要求的，是取消下院議員不得兼任閣員的限制。其着眼點雖不相同，但爲個人爭取政權的目標實屬一致。前者固然危及軍人政權，後者亦同樣會使內閣轉入黨人手中，將根本推翻積極的國防思想，再探兩面外交而放棄阻侵略于國境外的政策。所以這批主張修憲的議員，無論是反對派與執政黨，都已成爲共黨的統戰工具，非常適合乃比里製造政爭的要求。

以反對加稅法案而控制國防的財源，再由預算分配案的波折，造成國防經費不能適時支付，其間大多數議員與政府爲難，固然是爲了達成個人支持費的要求，其實也正適合共黨迫使政府無法擴充兵力，祇有與共匪暗中勾搭的目標。同時藉美軍急于撤出越南戰場所造成此一地區防務空虛的情勢，一面攻擊親美外交政策的錯誤，一面主張與共匪及北越謀求關係的緩和；以致乃他納由力主親美外交，一變而爲左右搖擺不定，且不惜過赴巴黎乃比里求教，但又遭到右派的羣起而攻。祇要從最近兩年來，主持泰國外交的他納言行首鼠兩端，及其所遭到國會的攻擊，即不難想見國會的壓力，已使政府在外交上的舉棋不定(註廿一)。

當然，政府內部也有人主張不防挾共黨國家以要脅美國的，尤其開拓對共黨國家的貿易。但這其間又有人主張祇能限于對蘇俄及東歐國家，斷不可重開對匪貿易，以免共匪將戰爭隨匪貨而同時輸入，華僑商人變成北平赤化泰國的工具。可是當蘇俄及其附庸國都已爲泰國農產品的顧主，及泰俄已訂航空協定時，更有人認爲此適足以刺激共匪對泰共叛亂的支持，因而使大馬強調的平衡匪、美、俄關係——要求保證東南亞中立化，本不爲泰方所欣賞，一變而使他納成爲此項宣言的起草人。共匪對泰方談判的要求也已于最近有了反響，這說明北平認定他納的奔走，正是它對泰統戰所發生的效果，等進入其安排的套索後，即可一步步的加緊。(註廿二)

反對與共匪包括貿易往來的，在泰國內部，是以巴博爲首的大部份軍警高級要員及乃樸等學者專家，他僂則是虛懷的遷就各方面意見，尤其應付國會反對黨及執政黨的造反派，一向是多方安撫。當去年國會發生加稅法案的風波時，巴博等力主以政變解散國會，結果終被他僂所制止，使叛黨份子又重回陣營，于是國會有彈劾巴博等風潮的醞釀，另一部份執政黨議員則擁護巴博力主他向他僂奪權。一時風雨滿樓，他僂遂有今年十月屆滿六十歲自動退役——交出軍事統帥職務，至一九七三年退出政壇歸隱的宣佈。(註廿三)

很顯然，他僂是在外受國會壓力，內部又得不到核心份子諒解的情況下而不得不表示倦動。果然如此，則泰國的軍警職政集團，必將因此形成分裂，更更適合于共匪以統戰顛覆泰國政府的目的。但在今年六月間當他僂訪問大馬之際，巴博以副院長主持國務會議，斷然作成了延長他僂軍職的決議(

註廿四），平息了他急于担任國防部長的謠言，也造成了他儼不能不領導這次政變的形勢。因此，這次政變，至少已表示了軍方是團結一致，並沒有被共匪所進行的統戰而造成分裂。

六 政變顯示美泰繼續合作禦匪

形成泰國政潮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以及在外交上的舉棋不定，固然是由于北平利用泰國國會重開所進行的統戰；而華府對共匪由秋波暗送到公開宣佈尼克森訪問北平，又是主要原因。雖尼克森一再表示不放棄對東南亞防衛的承諾，且在訪泰時，堅決應允為泰國協防無分內外敵人；但由于他對匪政策的突變，誰又敢于相信他的諾言？何況北平對仰光既已重修舊好，與吉隆坡訂立直接貿易關係，更極盡遷就籠絡之能事。此不僅助長了國會與執政黨左傾政客們的姑息氣氛，即政府的死硬派亦不能不為之動心。

撇開主張與北平河內勾搭的前外長他納奔走不說，一直是軍警執政集團核心人物的外交部副部長沙牙，最近幾個月來，也是僕僕風塵于吉隆坡與仰光之間；在政變的前幾天，閣議又決定授權他納與共匪作大使級的談判（註廿五），這都顯示泰國的外交路線已到急轉直下的邊緣。不過華府如無意放棄東南亞，便不能讓泰國的外交轉向。因為西貢和曼谷在美國對東南亞的防衛形勢上是相互支援的兩大基地，失去其一，則在寮國和高棉便無法與共軍週旋，整個東南亞都將沒有美軍立足之地。當然，泰國軍方祇要華府仍有保持泰越基地阻共軍于寮高的決心，使其阻敵人于國境外的國防計劃繼續貫徹，自會竭力使被迫轉向的外交政策懸岩勒馬。所以此次政變，也透露了華府今後在東南亞的防衛方面，已取得了泰國軍方的信心。

據本年十月十八日寮共發佈的消息：華府已撥出廿萬美元經費，作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擴充寮國特種部隊的用途，準備在今年年底以前，編組成一百廿個營——共計七萬餘人的僱傭兵團，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派駐在寮國苗將萬保將軍的總部統一指揮，以配合永珍部隊向寮共控制區進行反游擊戰（註廿六）。至十月十一日，寮共又以抗議函送致日內瓦會議主席團，指摘寮國最近派兵五營入寮，使寮國入寮部隊已達廿五個營（註廿七）。曼谷否認寮軍入寮，但承認寮籍寮人曾參加永珍的招募。顯見這些部隊都是

美國編組裝備的入寮僱傭兵，也說明泰國政府對美國編組援寮特種部隊是竭力贊助，且視為是解除共匪新築滇寮公路以威脅泰邊的最佳對策。

再就泰方于宣佈將與共匪展開大使級的會談消息的第二天，接着發佈泰境美軍決定暫停撤退的消息，並指出泰美雙方認為北越共軍目前對高棉與寮國正展開侵略戰爭，一旦得手，泰國安全即受威脅，所以必須繼續利用在泰基地，發揮美軍強大的空中威力以挽救寮高兩國的厄運。駐泰美軍尚有三萬二千人，其中空軍兩萬六千，海軍四百，陸軍五千七百人，如果配合美方今年年底前編成的特種僱傭混合部隊七萬人，對寮高戰場，實為相當強大的防衛力量。加上美國高級官員曾向他納保證，儘管美國接近共匪，惟仍將負起美國對東南亞公約的責任（註廿八），這說明泰國以政變擺脫內在的左傾壓力，也正是由于泰美雙方已先有阻止共黨侵略的部署與決心。

七 結論

誠然，泰共的叛亂在共匪和北越的支持下已日益擴大加強，東北、泰北、泰南都有其叛亂基地，且已延及中部邊緣，當他儼所領導的軍人集團以政變擺脫了左傾政客壓力後，泰共的武裝叛亂勢必昇高。但泰國的安危一向不在邊地的得失，乃在京吞兩府及其附近的中部平原能否防守。就經濟命脈而言：此一地區既擁有沃野千里的富庶農田，又是工廠林立掌握着海、陸、空交通樞紐的重鎮；就政治來說：祇有帝國之下得奉泰皇的詔命，方可以收攬全國人心。這從鄭王及現王朝建都京吞地區後即平定了全國諸侯，與自一九三二年以來歷次革命，都因控制曼谷使全國各地無不傳檄而定即可概見。（註廿九）

因此，全泰四境邊疆的共黨武裝叛亂，祇是肢體的癱瘓疾病，共黨藉國會所進行的政治顛覆，才是病入膏肓。他如掌握了泰國經濟命脈的華僑都集中在京吞重地，雖共匪無時不在企圖利用他們為赤化泰國的工具，但由于他們心向祖國，竭誠擁護我總統反攻大陸，所以祇要泰國政府堅決反共與中華民國站在同一立場，華僑便永遠是支持泰國反共的主力，在經濟發展上，必能獲得他們極大的助力。由一九五八年成立軍政以來，泰國政府始終禁止與大陸貿易往來，不許出售匪貨，想見軍方深悉此中利害。此次政變以後，對此項禁令勢必更加雷厲風行。使混入聯合國後的共匪雖企圖造成東南亞的姑

息逆流，而泰國三百萬華僑仍將可作中流砥柱。

實行經社建設，是前軍政府配合剿共軍事的政治本工作。自一九六一年開始，至今已進入第三期，由于經濟成長率已達到百分之七至八（註卅），顯示將可逐漸達成由繁榮導致安定的目標。本年的預算案由于國會多方阻撓，對此項建設的實施影響最大。政變以後，政府即可按照計劃加強經建，這是對剿共軍事大有助益的。何況泰共的武裝叛亂昇高，須仰賴于來自北平及河內的補給。美軍既對寮國高棉的戰局另有協防的兵力，且着重于向共黨控制區進行反游戰，其北部的補給線必將受阻；加上泰馬聯合剿共，已以海空聯合阻擊共匪的海上運輸，可見泰共的武裝叛亂昇高亦極其有限。

政變後的泰國新政府，雖不能完全恢復開放民主前的政策，但必然是循此一堅決的反共途徑而遏阻赤浪橫流，這對整個東南亞以至自由世界都是值得欣慰的。

註(一)(四)(五)(六)(七) 請參閱本刊十卷一期拙著「從泰國政潮看共匪統戰」一文。

註(二)(三) 參見朱鶴著「東南亞新興國家」。

註(八) 參見程浩著「東南亞列國誌」。

沙達特訪俄與中東新危機

石樂三

一 前言

自從以阿戰爭結束之後，到現在已進入第五個年頭了。在這四年裏，儘管經過聯合國特使賈林的調停，美、英、法、俄四國會議解決中東問題，以及美國單獨的提出所謂羅吉斯的中東停火與談判計劃，且經以阿雙方同意接受，於去（一九七〇）年八月實施停火，開始談判；今年二月埃及自行提出一項重行開放蘇彝士運河計劃；緊接着，羅吉斯國務卿又提出暫時性的和平新計劃；可是，一直沒有獲得結果。埃及唯恐長此拖延，愈使以色列堅定其長期佔領政策，加以國內的極端份子與好戰派青年軍官的壓力，所以沙達特總統不得不宣佈「一九七一年為決定年」，無論是戰是和，必須在今年以內

註(四) 見共匪「新華社」一九六九年一月十日廣播稿。

註(五) 見謝猶榮著「暹羅國誌」。

註(六)(七) 請參閱本刊六卷九期拙著「泰國防共的政略與戰略」一文。

註(八)(九) 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曼谷世界日報載泰國政府施政報告。

註(十) 見謝猶榮著「泰國七十一府新誌」。

註(十一) 見本年十一月十四日香港星島日報。

註(十二) 見一九六八年頒佈的泰國第八憲法第六及第七章。

註(十三) 見一九七〇年八月三日法新社曼谷電。

註(十四) 見本年五月廿七日中國時報刊載該報駐東南亞特派員以「泰國探微」為題的通訊。

註(十五) 見本年十一月十四日香港星島日報。

註(十六) 見本年六月十六日路透社曼谷電。

註(十七) 見本年十月十九日南洋商報刊載合衆、路透社、法新社東京十八日電。

註(十八) 見本年十一月十五日星島日報刊載泛亞社十四日曼谷電引他納談話。

註(十九) 見一九六八年九月卅至十月三日華盛頓星報連載寇克(Donald Kirk

)所撰「泰國的剿共戰爭」一文。

決定。因之，中東局勢又陷於新危機。

二 沙達特訪俄的使命

埃及總統沙達特，應俄共中央、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及俄政府的邀請，曾於十月十一日前往蘇俄作正式訪問，隨行人員有國防及外交部長等。

沙達特在莫斯科逗留三天，曾與俄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包戈尼，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舉行會談，討論了兩國關係與國際問題，特別重視中東局勢及為消除以色列侵略後果而進行的鬥爭。在十月十二日的會議中，再次重申兩國將繼續發展與鞏固蘇聯埃及的友誼與全面合作。